

#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邹朝斌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阴阳五行思想作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 自然会对汉赋创作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阴阳五行思想首先直接地表现在汉赋文本中: 阴阳观念主要从汉赋描述自然天道与社会人伦两个方面的内容中表现出来; 五行观念主要通过五德终始说在汉赋中有诸多体现。其次, 阴阳五行思想中“时序—方位—五行—颜色”对应体系的确立, 极大地影响了汉赋中时间、空间、颜色的表述, 这些表述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最后, 阴阳五行思想通过其方位意识潜在地影响汉赋的结构, 使汉赋具有强烈的结构意识与秩序感。

**关键词:** 阴阳五行; 汉赋; 时空; 颜色; 秩序感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20)01-0115-11

**收稿日期:** 2019-03-29

**作者简介:** 邹朝斌(1990—), 男, 湖南邵阳人, 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阴阳五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 它源远流长且影响极广。西汉董仲舒总结发展前人之说, 将阴阳、四时、五行统摄于“天”之下而形成一个世界图式, 把自然现象、社会历史、道德人伦都纳入这个世界图式之中加以阐释, 使阴阳五行思想变得更加完备而开始盛行。其后, 东汉章帝为统一经义而召开白虎观会议, 班固奉命作《白虎通》, 其中有《五行》一篇, 从而使阴阳五行思想官方化。《汉书》与《后汉书》中亦列《五行志》, 足见阴阳五行思想在汉代影响之盛。正如顾颉刚所言: “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 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 在政治上, 在学术上, 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其结果, 有阴阳之说以统辖天地、昼夜、男女等自然现象, 以及尊卑、动静、刚柔等抽象观念; 有五行之说, 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与其作用统辖时令、方向、神灵、音律、服色、食物、臭味、道德等等, 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sup>①</sup>

作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 阴阳五行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 也势必影响到文学创作, 特别是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创作。学界对阴阳五行思想的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 而对阴阳五行思想与汉赋之关系的研究甚少, 且缺乏从汉赋文本内部出发探讨阴阳五行思想影响的视角。目前, 学界对阴阳五行思想与汉赋关系的研究仅有韩雪《论邹衍对汉赋的影响——汉赋探源》《关于汉大赋与阴阳五行说关系的两点补充》两文, 从邹衍书与汉大赋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雷同、汉代赋家的思想渊源、汉大赋产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对阴阳五行思想影响汉大赋作了初步探讨<sup>②</sup>, 但缺乏对汉赋文本的具体分析, 论证过程亦有牵强之处。孙晶《阴阳五行学说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一文则探讨了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骚体赋空间建构的影响<sup>③</sup>, 颇有见地, 但仅

①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 页。

② 韩雪《论邹衍对汉赋的影响——汉赋探源》, 《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第 6 期; 韩雪《关于汉大赋与阴阳五行说关系的两点补充》,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3 期。

③ 孙晶《阴阳五行学说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 《齐鲁学刊》2004 年第 3 期。

就骚体赋空间建构这一方面而言。可以说,目前还未有专文对阴阳五行思想如何影响汉赋作比较全面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即抉隐索微,试图从共时性<sup>①</sup>的角度论述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创作的影响,分别揭示阴阳、五行观念在汉赋文本中的表现,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时间、空间、颜色表述的影响,以及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结构的潜在影响。

## 一 阴阳、五行观念在汉赋文本中的表现

### (一) 阴阳观及其在汉赋中的表现

阴阳观念的出现早于五行,从文字上来看,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出现了“阴”“阳”二字,但是甲骨文中的“阴”“阳”二字均单独出现,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并无深意。阴的古字为“霁”,《说文》:“霁,云覆日也。从云,今声。霁,古文霁省。”段玉裁注曰:“今人阴阳字小篆作霁易。霁者,云覆日。易者,旗开见日。”<sup>②</sup>阳的古字为“易”,《说文》:“易,开也。”段注曰:“此阴阳正字也。阴阳行而霁易废矣。”<sup>③</sup>又《说文》云:“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sup>④</sup>故“阴阳”二字本义当是有无日光的两种天气,从有无日光衍生出明与暗、暖与冷的含义,进而与方位的背阴或向阳联系,有了表示山水之南北的含义。在《诗经》《尚书》以及《周易》卦爻辞中的阴阳二字,多合上述表自然现象之本初义,“商周以前所谓阴阳者不过自然界中一种粗浅微末之现象,绝不含有何等深邃之意义”<sup>⑤</sup>。

春秋时期阴阳观念有所发展,阴阳由自然现象演变为天所生六气中的二气。《左传·昭公元年》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sup>⑥</sup>可见阴阳开始从具体所感之现象向抽象之概念发展,而且已经出现了将阴阳与四时相配的模糊意识。到了《易传》,其中体现出来的阴阳观念已经比较成熟了,将阴阳与《易经》中“--”和“—”两个代表不同性质的符号相对应,以此为基础生发出对宇宙人生的解释。如《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sup>⑦</sup>《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sup>⑧</sup>正如《庄子·天下》所云,“《易》以道阴阳”<sup>⑨</sup>。至此,阴阳已经作为生发出宇宙万物的二种基本元素而存在,阴阳观念也逐渐被认作解释宇宙社会人生的原则规范。

这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阴阳观念对中国古代思想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自然也会在汉赋中表现出来。大体上看,汉赋在内容上主要通过通过对自然天道与社会人伦两个方面的描述表现出阴阳观念。

首先,我们来看汉赋内容中对天道与自然的描述所表现出来的阴阳观念。如前所述,阴阳被视为形而上的两种基本元素,用以解释宇宙天地的形成与自然万物的生长,这种以阴阳观念为核心的宇宙天道观在汉赋中多次出现。如崔骃《达旨》:“古者阴阳始分,天地初制。”<sup>⑩</sup>张衡《骷髅赋》:“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sup>⑪</sup>蔡邕《笔赋》:“画乾坤之阴阳,赞宓皇之洪勋。”<sup>⑫</sup>其中的“阴阳”均指宇宙中的阴阳二气或两种基本元素,亦可指代天地万物。阴阳不仅构成宇宙天道,而且通过此消彼长的变化推动其运转,这在汉赋中亦有描述。如贾谊《鹏鸟赋》:“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交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块扎无垠。……且夫

① 所谓“共时性”,指的是本文的研究角度,与“历时性”相对而言。本文研究从“共时性”角度出发,即将两汉数百年视为相对静态的时间维度,在此维度内研究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创作的整体影响。而非从历时性角度出发,描述阴阳五行思想在两汉不同时期的演变情状及其对汉赋创作的影响。

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580 页。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 458 页。

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 738 页。

⑤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 5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7 页。

⑥ 《春秋左传正义》,杜预注,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025 页。

⑦ 《周易正义》,王弼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78 页。

⑧ 《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93-94 页。

⑨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062 页。

⑩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4 页。

⑪ 佚名《古文苑》,章樵注,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2 页。

⑫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 929 页。

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sup>①</sup>以炉喻天地，以工喻造化，以炭喻阴阳，以铜喻万物，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在以阴阳为原动力的运转推移作用之下，自然与社会中的万物都在反复激荡中消长离合，永不停歇。又如《论都赋》：“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而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sup>②</sup>阴阳观认为万事万物都处于不断的消长变化中，正如《易传·丰》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sup>③</sup>杜笃在此论述阴阳消长、相互转化对天道运转、万物生长的影响，告诫光武帝要认识到物极必反，因此必须居安思危，仁义与城池兼备。

汉赋中亦有描写阴阳运转对自然万物生长造成影响的内容。如《东京赋》中描写阴阳平和、万物顺时生长的状态：“于是阴阳交和，庶物时育。”<sup>④</sup>此处“阴阳交和”当指天地之间阴阳二气此消彼长而达到和谐稳定的状态，从而使自然界风调雨顺、万物依时生长。假使阴阳之气不和谐时，自然社会就会失去平衡，灾异就会出现。《东京赋》：“冯相观祲，祈禳禳灾。”李善注曰：“《周礼》曰：‘春官宗伯，冯相氏掌日月星辰之位，辨其灾祥，以为时候。’郑玄曰：‘冯，乘也。相，视也。祲，谓阴阳气相浸渐以成灾也。’”<sup>⑤</sup>阴阳二气不和而相侵，渐渐发展成自然与社会中之灾，即“祲”，故进行祈福以求除去灾害。

其次，我们再来看汉赋内容中对社会与人伦的描述所表现出来的阴阳观念。汉赋中关于宫室营造的描述明显体现出阴阳思想的影响。《西都赋》：“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李善注：“《七略》曰：‘王者师天地，体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内有太室，象紫微宫；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宫之言中也。言天神图法，阴阳开闭，皆在此中也。’”<sup>⑥</sup>《鲁灵光殿赋》：“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煴。”张铤注：“言此殿包含阴阳元气以成之。烟煴，元气之貌。”<sup>⑦</sup>阴阳思想影响了汉代宫殿的营造观念，这是赋中出现此类描述的思想基础。不管是从细处描述未央宫的选址与布局体天象地，东西南北四方都符合阴阳运转的原则；还是从大处概括灵光殿的形成，含阴阳元气而成，两者都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sup>⑧</sup>。赋中描写宫殿的内容受阴阳思想影响，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西汉时期，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sup>⑨</sup>，儒家思想与阴阳思想相互交融，故汉赋中诸多涉及伦理纲常的叙述也可见阴阳观念的影响。如蔡邕《协和婚赋》中论及幽微玄妙的人伦之始：“考邃初之原本，览阴阳之纲纪，乾坤和其刚柔，艮兑感其膺腓。”<sup>⑩</sup>此处即是以阴阳观念为统摄，将乾坤、刚柔与夫妇相对应，阴阳在此即指代男女。意谓考察远古人类之本源，就要观览男女伦常之法度，蔡邕在此是以阴阳观念追溯人伦之始。又如王褒《洞箫赋》先言虫鱼鸟兽闻箫声尚且深受感染，又说：“况感阴阳之和，而化风俗之伦哉！”何况是天地阴阳之和，受到伦理道德之教化的人呢！故李善注：“《家语》曰：‘人也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sup>⑪</sup>在此用阴阳观念意在阐明“人”有秉赋天地大德、受阴阳交合而生的伦理意义。

其实，阴阳观念对汉赋内容中自然天道与社会人伦两个方面的影响并非泾渭分明，汉赋中也会出现阴阳观念同时影响两者之处。如贾谊《旱云赋》：“或窈窕而四塞兮，诚若雨而不坠。阴阳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贪邪而狼戾。”《古文苑》章樵题注云：“在《易》，坎为水，其蕴蒸而上升则为云，溶液而下施则为雨，故《乾》之‘云行

① 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607页。

②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388页。

③ 《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67页。

④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124页。

⑤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106页。

⑥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11页。

⑦ 《六臣注文选》，萧统编，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1页。

⑧ 《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页。

⑨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17页。

⑩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938页。

⑪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789页。

雨施’，阴阳和畅也；《屯》之‘密云不雨’，阴阳不和也。在人，则君臣合德而泽加于民，亦犹阴阳和畅而泽被于物。”<sup>①</sup>很明显，此处以“阴阳分而不相得”来说明自然界的阴阳不协调造成久旱无雨，其阴阳观念首先是指向自然天道的。但是，纵观全赋内容及其创作背景可知，当时政治环境黑暗，贾谊时运不济，受周勃、灌婴等人的排挤迫害，又遇大旱，故赋中亦用阴阳不相得来解释人伦社会中君臣之道不合，从而造成贪邪狼戾之风，而这也成为久旱的原因之一。《旱云赋》以阴阳观念为出发点，从自然天象、社会人事两个方面指出不雨的原因。故费振刚说，“文中的阴阳不仅用来解释云行雨施这个规律，还应用于君臣之道、天人感应方面”<sup>②</sup>。

总之，阴阳观念对汉赋内容的影响可以说是广且深的，汉赋中涉及的天地之形成、自然之运转、宫室之营造、人伦之秩序、成败之法式等内容，都能找出阴阳观念的痕迹。

## (二)五行观及其在汉赋中的表现

五行观较之阴阳观后起，较早对五行进行记载解释的是《尚书·洪范》：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sup>③</sup>

孔颖达疏曰：“《书传》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sup>④</sup>可知当时的五行指五材，是百姓生活中重要的五种物质资材，也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天生五材，民并用之”<sup>⑤</sup>之义，这代表了战国以前五行的基本含义。

战国时期五行观逐渐发展，自战国初期一直到孟庄时代，儒家系统与《墨子》、《庄子》中均无五行一词出现，《墨子》中出现的“五行无常胜”一语当是杂采邹衍之说<sup>⑥</sup>。但是从现存文献来看，五行观到战国后期已经成熟，邹衍将原来形而下的五种重要生活资材之五行看作是形而上的五行之气，且将其与此时已经成熟的阴阳观相结合而形成“五德终始说”。正如张毅先生所说：“只有像邹衍一样，将五行说成是五行之气，才能与阴阳互为表里，形成以四时变迁相配合的五行相生相胜理论。”<sup>⑦</sup>关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sup>⑧</sup>其中“五德转移”即《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刘歆《七略》所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sup>⑨</sup>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气所生发出的五种作用，每一个朝代对应某一五行之气，等到这个朝代衰败时，即由另一克制前者之德的五行之气取而代之。

这种阴阳五行思想主导的历史运行观念，在秦汉时期颇为流行，自然也会反映到汉赋中。如《德阳殿赋》：“若炎唐，稽古作先。”<sup>⑩</sup>此处“炎唐”即陶唐氏尧帝，因其在五德循环中被认为属火德，故称“炎”。《东京赋》：“尊赤氏之朱光，四灵懋而允怀。”李善注引薛综注：“赤氏，谓汉火德所统，赤帝燮怒也。”<sup>⑪</sup>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云：“赤氏：五帝中的南方赤帝。汉朝崇火德，所以尊赤氏。”<sup>⑫</sup>《南都赋》：“曜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李善注：“朱光，火德也。”<sup>⑬</sup>《鲁灵光殿赋》：“殷五代之纯熙，绍伊唐之炎精。”李善注：“言汉盛于五代纯熙之道。而绍帝尧火德之运。”<sup>⑭</sup>以上均是汉赋中涉及五德相应与转移的内容，言尧帝或汉朝为火德。又如

①佚名《古文苑》，章樵注，第69-70页。

②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19页。

③《尚书正义》，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8页。

④《尚书正义》，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8页。

⑤《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97页。

⑥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附录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⑦张毅《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审美理念》，《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第15页。

⑧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48页。

⑨萧统《文选》，李善注，第287页。

⑩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576页。

⑪萧统《文选》，李善注，第115页。

⑫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705页。

⑬萧统《文选》，李善注，第160页。

⑭萧统《文选》，李善注，第509页。

班固《幽通赋》：“系高颡之玄冑兮，氏中叶之炳灵。”“高颡”即传说中的颡颥帝，《文选》吕延济注：“玄，水色。高阳氏水德，故云。”<sup>①</sup>班固在此叙述自己是颡颥的子孙后代，蕴含颡颥以水德王之义。五德终始说的内容不仅在于五行循环更迭，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循环的过程中，凡是某一五行之德兴起，则会出现与之相应的征兆。《吕氏春秋·应同篇》中有被视为邹衍佚文的以下文字记载：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sup>②</sup>

帝王将兴，上天必定会显现出征兆、符命，且这些征兆与符命的五行属性与将兴帝王所属之德相同，如黄帝以土德兴，故有“大螾大蝼”之征兆；禹以木德兴，故有“草木秋冬不杀”之征兆等等。

汉赋中对这种与五行观念密切相关的征兆与符命亦有诸多描述。杜笃《论都赋》：“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助，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sup>③</sup>据《汉书·高帝纪》载，高帝初起，夜行泽中，醉斩大蛇，有一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颜师古注引应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畴，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畴，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sup>④</sup>时人以为秦居西，祠白帝，属金德，白蛇即象征秦。“斩白蛇”乃赤帝子斩白帝子，为火德胜金德之征兆，故赋中对此符命的描述是完全遵循五德终始说之内容的。汉高祖之后起兵遂以赤色为旗帜的颜色，这在汉赋中也有所描述。《东京赋》：“高祖膺箓受图，顺天行诛，杖朱旗而建大号。”李善注曰：“《春秋命历引》曰：‘五德之运征符合，膺箓次相代。’……《汉书》，高祖立为沛公，旗帜皆赤，故曰朱也。”<sup>⑤</sup>“膺箓”即受符命之义，高祖斩白蛇即是受天命而为君的符命，汉赋中“杖朱旗”亦是其顺天命行事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也是符合五德终始之说的，自然也是受五行观念的影响。又如光武帝所受符命在汉赋中也有表现，如《论都赋》：“于时圣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获助于灵祇。”<sup>⑥</sup>此处圣帝即指光武帝刘秀，他所受的“天人之符”指强华自关中所持的《赤伏符》，《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载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sup>⑦</sup>符命内容之“火为主”亦符合时人以汉为火德的五行观念。

符命即是天命的代言，既然帝王受天命而建立新的王朝，就要对社会制度革故鼎新，以示对天命的遵循，“改正朔，易服色”就是一种这样的措施。董仲舒所谓“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sup>⑧</sup>。《汉书·律历志》亦载：“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sup>⑨</sup>而这些改革的内容与五行的顺逆也是息息相关的。如秦始皇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故以水德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sup>⑩</sup>。这种五行观念下的改革措施在汉赋中亦有表现。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李善注引郭璞曰：“变宫室车服，衣尚黑。更以十二月为正，平旦为朔。新其事。”<sup>⑪</sup>故此处描写当是武帝太初改历主土德之前，

①《六臣注文选》，萧统编，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第269页。

②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84页。

③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386页。

④班固《汉书》，第7-8页。

⑤萧统《文选》，李善注，第96页。

⑥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388页。

⑦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1页。

⑧班固《汉书》，第2518页。

⑨班固《汉书》，第975页。

⑩司马迁《史记》，第306页。

⑪萧统《文选》，李善注，第377页。

时人以为汉承秦尚水德的反映。

从以上所述五行观及其在汉赋中的表现可知,五行观念大多通过五德终始说在汉赋内容中表现出来,且与刘汉王朝的政治紧密联系,其中叙述两汉王朝之建立者——汉高祖与光武帝的事迹特别多(关于高祖的描写尤甚)。这与阴阳五行思想对两汉政治影响颇深的历史现实密切相关,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对此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赘。

## 二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时间、空间、颜色表述的影响

阴阳与五行结合之后,进一步把季节、方位、颜色、音律、味道、帝王、神明等自然社会中的种种事物纳入其中而组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与《礼记·月令》。董仲舒则总结发展《吕氏春秋》与《礼记》之说,“把阴阳四时五行的气,认定是天的具体内容,伸向学术、政治、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完成了天的哲学大系统,以形成汉代思想的特性”<sup>①</sup>,从而使阴阳五行思想变得更加完备而开始盛行。董仲舒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sup>②</sup>他将阴阳、四时、五行统摄于天之下,认为阴阳未分时是合而为一的,再分为阴阳,阴阳分为四时。在此基础上将时间、空间与阴阳五行相配:

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故至春少阳东出就木,与之俱生;至夏太阳南出就火,与之俱暖。……至于秋时,少阴兴而不得以秋从金,从金而伤火功,虽不得以从金,亦以秋出于东方……至于冬而止空虚,太阳乃得北就其类,而与水起寒。(《春秋繁露·阴阳终始》)<sup>③</sup>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春秋繁露·五行对》)<sup>④</sup>

董仲舒先言阳主春夏,阴主秋冬,再将阴阳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在阴阳的消长中与四时、四方相配,又在四时中生出“季夏”,与五行中的“土”相配。这样就成功地将阴阳、五行、时间、空间完整地对应匹配。这种匹配模式在《白虎通·五行》《汉书·五行志》《后汉书·五行志》中都得到了延续。

### (一)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时间、空间表述的影响

将阴阳五行与四时五方相配的阴阳五行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汉赋中关于时间的表述。例如汉赋中对季节的表述,既用阴阳指代,又用颜色指代。如《七发》:“陶阳气,荡春心。”<sup>⑤</sup>此处阳即春之义。傅毅《七激》:“阳春后荣,涉秋先彫。”<sup>⑥</sup>张衡《温泉赋》:“阳春之月,百草萋萋。”<sup>⑦</sup>阴阳五行中阳主春夏,故春亦称为阳春,以上赋中“阳春”即春季的意思。刘歆《遂初赋》:“运四时而览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sup>⑧</sup>“览阴阳”在这里指观察四季的交替变化。《西京赋》:“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李善注引薛综注:“阳谓春夏,阴谓秋冬。”<sup>⑨</sup>以上均是汉赋中用阴阳指代季节的例证。汉赋中又有用颜色指代季节的,详见下文。

在汉赋的时间表述中,也有用阴阳表示朝夕昼夜的。如《西都赋》:“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刘良注:“言宫殿千门万户皆夕闭朝开。夕为阴,朝为阳。”<sup>⑩</sup>《西京赋》:“仰福帝居,阳曜阴藏。”李周翰注:“阳,日也,言光色可以曜日,深邃可以藏阴。”<sup>⑪</sup>这都是以阴阳指代时间上的朝夕与昼夜。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

②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55页。

③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31-332页。

④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06-307页。

⑤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1567页。

⑥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427页。

⑦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756页。

⑧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318页。

⑨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48页。

⑩ 萧统《六臣注文选》,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第31页。

⑪ 萧统《六臣注文选》,李善、吕延济、刘良等注,第47页。

另外,阴阳五行思想亦影响汉赋中对时间的动态描述,如王褒《洞箫赋》:“感阴阳之变化兮,附性命乎皇天。”<sup>①</sup>此处阴阳变化即指四时变迁、寒暑易节。又如蔡邕《释海》:“日南至则黄钟应,融风动而鱼上冰,蕤宾统则微阴萌,蒹葭苍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阴阳代兴,运极则化,理乱相承。”<sup>②</sup>这几句话描绘了一个阴阳五行影响下自然界从冬季到秋季的动态变化过程。“南至”即冬至,《礼记·月令》中与仲冬时节相配的音乐为:“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黄钟。”<sup>③</sup>“融风”即东北风,《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sup>④</sup>意谓暖风东来,冰雪融化,万物复苏,春季来临。“蕤宾”之音律则是与仲夏时节相配,此时虽是阳气盛,但阴气已微微生成,正如《月令》所载:“仲夏之月……日长至,阴阳争。”郑玄注:“争者,阳方盛,阴欲起也。”<sup>⑤</sup>故赋中曰“微阴萌”。秋季则是阴气渐盛,故而蒹葭苍苍、露凝而白。

阴阳五行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汉赋中关于空间的表述。赋中用阴阳来表示四方的,如《大人赋》:“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sup>⑥</sup>《鲁灵光殿赋》:“承明堂于少阳,昭列显于奎之分野。”<sup>⑦</sup>少阳、太阴即是董仲舒将阴阳二分为四中的两者,少阳指东方,太阴指北方。《大人赋》以此指代仙境中的东方极远之地与北方极远之地。言其由东极斜渡北极,向真人求取成仙之道。在《鲁灵光殿赋》中,灵光殿在鲁,鲁在东,故称其为少阳。汉赋中也有以五行来表示方位的,《平乐观赋》:“弥平原之博敞,处金商之维陬。”<sup>⑧</sup>《西京赋》:“似阊风之遐坂,横西洫而绝金墉。”李善注引薛综注:“墉,谓城也。绝,度也。言阁道似此山之长远,横越西池而度金城也。西方称之曰金。”<sup>⑨</sup>《东京赋》:“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飞云龙于春路,屯神虎于秋方。”李善注引薛综注:“金商,西门名也。……西为金,主义,音为商,若秋气之杀万物,抗天子德义之声,故立金商门于西。……德阳殿西门称神虎门。神虎,金兽也。秋方,西方也。”<sup>⑩</sup>以上“金商”“金墉”之“金”皆指代方位之西。其中的“秋方”指代“西方”,出现了以季节指代方位、以时间表述空间的现象。不过,这些都符合阴阳五行思想中五行之金与方位之西、时序之秋对应的原则。

## (二)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颜色表述的影响

阴阳五行思想将五行、五时、五方、五色等依次匹配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颜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汉赋中颜色的表述。在此先以《礼记·月令》为例,对阴阳五行思想系统中颜色这一环略加介绍。《月令》中先言时序为春之时,“其日甲乙”,以甲乙名东方,此时“盛德在木”,天子“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故其色尚青(苍)。时序为夏之时,“其日丙丁”,以丙丁名南方,此时“盛德在火”,天子“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故其色尚朱(赤)。时序为季夏之末时,“中央土,其日戊己”,以戊己名中央,天子“乘大路,驾黄纛,载黄旂,衣黄衣,服黄玉”,故其色尚黄。时序为秋之时,“其日庚辛”,以庚辛名西方,此时“盛德在金”,天子“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故其色尚白。时序为冬之时,“其日壬癸”,以壬癸名北方,此时“盛德在水”,天子“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故其色尚玄(黑)。<sup>⑪</sup>可见在阴阳五行思想中,五时、五方、五行、五色的对应关系为:

①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783页。

②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948页。

③ 《礼记正义》,郑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82页。

④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5页。

⑤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69-1370页。

⑥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119页。

⑦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510页。

⑧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578页。

⑨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59页。

⑩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103页。

⑪ 《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2-1381页。

春季—东方—木—青(苍)  
 夏季—南方—火—朱(赤)  
 季夏—中央—土—黄  
 秋季—西方—金—白  
 冬季—北方—水—玄(黑)

“时序—方位—五行—颜色”的对应体系在阴阳五行思想中得以确立,故在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下,汉赋中存在着大量以颜色来表示方位、五行、时序的现象。例如以颜色词来表示或暗含方位之义的如下。

#### 青与东方:

入青阳而窥总章,历户牖之所经。(李尤《德阳殿赋》)<sup>①</sup>

《太平御览》卷五三三引《周书·明堂》:“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sup>②</sup>故“青阳”指明堂的五室之一,即位于左面东方的叫青阳,此处之“青”即暗含了东方之义。

#### 朱(赤)与南方:

临朱汜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枚乘《七发》)<sup>③</sup>

西荡河源,东澹海滢。北动幽崖,南耀朱垠。(班固《东都赋》)<sup>④</sup>

南游赤野,北洫幽乡。(张衡《骷髅赋》)<sup>⑤</sup>

《七发》中的“朱汜”指的是南方的水边。《东都赋》中的“朱垠”,李善注曰:“朱垠,南方也。”《骷髅赋》中的“赤野”,《古文苑》章樵注曰:“极南之地。”以上朱、赤皆指代南方。

#### 黄与中央:

伊黄虚之典度,存斗文之会宫。(黄香《九宫赋》)<sup>⑥</sup>

龚克昌解释“黄虚”曰:“言中央宫,五行在第五,属土,在九宫居中央。……五方中央神名,也即地神名。土色黄,故云。”<sup>⑦</sup>此处言黄虚所常居的中央之位,存在着文昌、斗魁众星所在的宫阙,所以“黄虚”之“黄”亦暗含了中央方位之义。

#### 白与西方:

蹶白门而东驰兮,云台行乎中野。(张衡《思玄赋》)<sup>⑧</sup>

《淮南子·地形训》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极。……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高诱注曰:“西南月建在申,金气之始也。金气白,故曰白门。”<sup>⑨</sup>《淮南子》将西南方向与白相对应,高诱则释“白门”为位于五行中“金”所生方位,所以此处的“白”在大方向上仍然是指向西方的。

#### 玄与北方:

遗屯骑于玄阙兮,軼先驱于寒门。(司马相如《大人赋》)<sup>⑩</sup>

遂作颂曰:丽哉神圣,处于玄宫。富既与地乎侔譬,贵正与天乎比崇。(扬雄《羽猎赋》)<sup>⑪</sup>

《大人赋》中之“玄阙”,《史记》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玄阙,北极之山。寒门,天北门。”《羽猎赋》中

①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 576 页。

② 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2418 页。

③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 1569 页。

④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 35 页。

⑤ 佚名《古文苑》,章樵注,第 131 页。

⑥ 龚克昌、苏瑞隆等《两汉赋评注》,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55 页。

⑦ 龚克昌、苏瑞隆等《两汉赋评注》,第 557 页。

⑧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 661 页。

⑨ 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35-336 页。

⑩ 司马迁《史记》,第 3710-3711 页。

⑪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 390 页。



之“玄宫”，李善注曰：“玄，北方也。《礼记·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很明显，以上两处均是用“玄”来指代方位之北。

汉赋中的颜色词不仅可以表示方位，还可以表示季节时序。如以颜色词表示春季，傅毅《扇赋》：“背和暖于青春，践朱夏之赫戏。”<sup>①</sup>“青春”一词当与《楚辞·大招》中义同：“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洪兴祖补注曰：“青，东方春位，其色青也。”<sup>②</sup>用颜色词中的“青”与春季并列表示春季。又如以颜色词表示夏季，王逸《机妇赋》：“于是暮春代谢，朱明达时。”<sup>③</sup>朱穆《郁金赋》：“岁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园以迴眺。”<sup>④</sup>《尔雅·释天》：“夏为朱明。”郭璞注：“气赤而光明。”<sup>⑤</sup>此处“朱明”即是指夏季。又如以颜色词表示冬季，扬雄《羽猎赋》：“于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李善注曰：“北方水色黑，故曰玄冬。隆烈，阴气盛。”<sup>⑥</sup>以玄描述与指代冬季。

另外，汉赋中关于颜色词的表述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既用颜色表述五行，亦用五行指代颜色。《东京赋》：“尊赤氏朱光，四灵懋而允怀。”李善注：“赤氏，谓汉火德所统，赤帝燔怒也。”<sup>⑦</sup>赤即代表五行之德中的火，此为用颜色表示五行。祢衡《鹦鹉赋》：“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李善注：“西方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为火，嘴有赤者，故曰火德。”<sup>⑧</sup>所以，这里的“金”与“火”分别指代鹦鹉羽毛的白色和嘴巴的红色，此为汉赋用五行指代颜色的例证。

由以上论述可见，在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下，汉赋中时空、颜色的表述存在着一定的复杂性。就时空表述而言，时间可以用阴阳、颜色来指代，空间也可以用阴阳、五行来指代；就颜色表述而言，颜色词既可以表示方位、五行、时序等多种含义，又存在颜色词与五行互相指代的现象。而这些复杂现象的出现，正是因为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内部的兼容并蓄，也只有将这种文本表述上的复杂性纳入阴阳五行思想体系中加以考察，才能更为全面准确地认识与理解汉赋中时间、空间、颜色表述的真正内涵。

### 三 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结构的潜在影响

阴阳五行思想不仅直接地表现在汉赋文本中，影响其时空、颜色的表述，更为深层的是阴阳五行思想通过其方位意识潜在地影响汉赋的结构，使汉赋具有强烈的结构意识与秩序感。

汉赋在内容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sup>⑨</sup>，但是在繁复的物象铺排中却表现出很强的结构意识与秩序感。胡应麟认为“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sup>⑩</sup>，这正是缘于汉赋大多以空间方位为叙述顺序来构撰文本。虽然这种“空间方位描写方式，与先秦以来人们重视空间关系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sup>⑪</sup>，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汉赋在局部结构上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阴阳五行思想对方位极其重视，司马谈说阴阳家“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sup>⑫</sup>。方位在阴阳五行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其思想系统中五方与阴阳、五行相配：木居东方，少阳起；火居南方，太阳盛；金居西方，少阴起；水居北方，太阴盛；土居中央。由此进一步论自然现象与社会人伦。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局部结构的影响自然也会表现在文本中。例如《子虚赋》中按照方位顺序铺排描写云梦泽的具体环境：

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菖蒲，茝离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

①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 425 页。

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16 页。

③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 829 页。

④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 839 页。

⑤ 《尔雅注疏》，郭璞注，邢昺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607 页。

⑥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 390 页。

⑦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 115 页。

⑧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 612 页。

⑨ 葛洪《西京杂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2 页。

⑩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 页。

⑪ 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41 页。

⑫ 司马迁《史记》，第 3995 页。

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薜苞荔,薛莎青蘋。其卑湿则生藏蓂蒹葭,东蕃彫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鼉,瑇瑁鳖鼉。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榲楠豫章。桂椒木兰,檠离朱杨。楂梨栲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鸛雉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蜿蜒羸豸。<sup>①</sup>

其中的方位顺序为东南西北,大体上正好对应了董仲舒所云的“天次之序”：“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sup>②</sup>《春秋繁露·五行对》：“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sup>③</sup>五行相生的顺序为木火土金水，此为“天次之序”，而五行与五方是一一对应的，故五方的“天次之序”当为东南中西北，这与《子虚赋》中东南西北的描述顺序是大体契合的。另外，其中描述视角的“高燥”、“上”可归于阴阳五行思想中之“阳”，“卑湿”、“下”可归于“阴”。可以说，《子虚赋》这一局部结构中“地形从高到低，视角从上到下，方位从东至北，这最终都可以归入董仲舒阴阳五行学说的系统观”<sup>④</sup>。

又如《大人赋》在描述“大人”游历仙境的四面八方时，所采用东南西北的顺序也遵循了阴阳五行学说。“大人”结交真人，然后开始展开游仙的历程，先“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从东方开始游历，让陵阳子明、玄冥、黔雷、长离等仙人陪同游历完东方，接着“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娵”，在句芒的带领下前往南方游览。然后“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由南向西而去，西方的游历以在昆仑之阴山与西王母相见为结束。接着“回车謁来兮”，经由北方返回人间：“近区中之隘狭兮，舒节出乎北垠。”<sup>⑤</sup>其中“大人”东南西北的游仙路线与上述“天次之序”是大体相符的，很明显是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另外扬雄《蜀都赋》中开篇描写即以“蜀都”为中心展开空间方位叙事：“东有巴賈……南则有犍泮潜夷……西有盐泉铁冶……北则有岷山……”<sup>⑥</sup>这一局部结构的安排顺序也是符合阴阳五行思想中运转模式的。

张衡《思玄赋》中亦是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来叙述神游过程的，尤为重要的是，赋中在描述主人公神游某一方时所经历的情景也符合这一方位所对应的五行属性。主人公的神游从东方出发：“过少皞之穷野兮，问三丘于句芒。”游览东海蓬莱、方丈、瀛洲三山，据《月令》中阴阳五行系统，东方属木，主生长，“句芒”乃主木之官，“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体现出的养生意识亦合木之属性。然后进入南方：“指长沙之邪径兮，存重华乎南邻。”在南方“跻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扬芒燿而绛天兮，水泫沔而涌涛。温风翕其增热兮，怒郁悒其难聊”。《淮南子·天文训》曰：“日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谓正中。”注曰：“昆吾邱在南方。”<sup>⑦</sup>赋中描述南方环境之炎热：火光四射、沸水流涌、热风聚合，这些都符合五行之火之属性。然后前往西方：“顾金天而叹息兮，吾欲往乎西嬉。”西方属金，主刑罚、杀戮，故赋中在此多描述肃杀凶险的情景，如“牛哀病而成虎兮，虽逢昆其必噬”，牛哀病而为虎噬其兄；“王肆侈于汉庭兮，卒衔恤而绝绪”，王皇后恣意妄为而绝后；“董弱冠而司袞兮，设王隧而弗处”，董贤死而无安寝之地。最后来到北方：“逼区中之隘陋兮，将北度而宣游。”北方属水，与冬季相配，阴气盛，故赋中有“坐太阴之屏室兮”，“经重阴乎寂漠兮”。环境皆清冷萧条，万物潜藏，故赋中描述此地环境为冰雪皑皑、寒风凄凄，“玄武缩于壳中兮，腾蛇蜿而自纠”。赋中按阴阳五行的运转模式神游结束，末尾又云：“结典籍而为诤兮，驱儒墨以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sup>⑧</sup>此处的“阴阳”当指阴阳家、阴阳学说，在此将阴阳与儒墨相提并论，可见张衡对阴阳五行思想之重视。赋中或许是有意识地以阴阳五行思想去精心建构上述神游顺序，使所描述之事物大多符合阴阳五行之属性。与此同时使赋中结构井然有序，具有强烈的秩序感。

①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350-351页。

②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13页。

③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06页。

④ 刘昆庸《汉赋山林描写的文化心理》，《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第142页。

⑤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119-120页。

⑥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第212页。

⑦ 何宁《淮南子集释》，第233-234页。

⑧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657-676页。

综上所述,作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阴阳五行思想在汉赋文本中既有直接的表现,汉赋中描述自然天道与社会人伦两个方面的内容表现出阴阳观念;五行观念主导下的五德终始说也在汉赋中有诸多体现。阴阳五行思想又通过“时序—方位—五行—颜色”的对应体系极大地影响了汉赋中时间、空间、颜色的表述,这些表述也因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阴阳五行思想还潜在地影响汉赋局部结构上的规划与整合,使汉赋表现出强烈的秩序感与结构意识。当然,本文侧重于论述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直接与潜在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上诸多汉赋的特征均出自阴阳五行思想之影响。事实上,盛世的时代环境、间歇的政局动荡、文人的复杂心态、赋家的知识结构、汉赋的文体流变等因素与阴阳五行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汉赋的体式与风貌、创作思想与艺术精神,进而成就了汉赋这“一代之文学”,这一点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另外,阴阳五行思想历经汉代的盛行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影响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汉赋的创作。实际上,阴阳五行思想对汉代诗文以及后代赋作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阴阳五行思想中的“时序—方位—五行—颜色”对应体系也影响了汉代诗文及后代赋作中时间、空间、颜色的表述。但是,作为汉代思想骨干的阴阳五行对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的影响具有集中性与独特性。即汉赋与汉代诗文、后代赋作相比,汉赋中有更多明显地体现出阴阳五行思想影响的内容,除去《春秋繁露》《白虎通》《汉书》等散文中专论阴阳五行的篇章,其他汉代诗文、后代赋作较少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且大都不像汉赋这样明显体现出来,此为集中性。相较于后代赋作,汉赋局部结构上受到阴阳五行思想影响,而汉代以后的赋作中很少有按照阴阳五行思想来安排局部结构的,此为独特性。以汉代之后京都赋的典范之作左思《三都赋》为例,《蜀都赋》中描述蜀都地理位置时云:“于前则跨蹶犍泮,枕轳交趾。……于后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于西则右挟岷山,涌渎发川。”<sup>①</sup>其大致的方位顺序为南北东西,与阴阳五行思想中的“天次之序”东南西北不相符,在整篇《三都赋》中也找不出东南西北顺序的方位描写。阴阳五行思想对汉赋创作的影响具有集中性与独特性,这也正是本文以汉赋为研究对象的重要出发点。

## Influence of Yin-Yang and Five-Element Thought on Han Fu Creation

ZOU Chao-bin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s the ideological backbone of the Han Dynasty, the Yin-yang and Five-element thought naturally has an influence on the creation of Han fu. The Yin-yang and Five-element thought is firstly directly expressed in Han Fu, in whose description of natural laws and social ethics th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is mainly expressed; Secondl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of “time series-orientation—five elements—color” in Yin-yang and Five-element thought greatly influenced the expression of time, space and color in Han fu, and these expressions also had their complexity. Finally, the Yin-yang and five-element thought potentially affect the structure of Han fu through its 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which provides Han fu with a strong sense of structure and order.

**Key words:** Yin-yang and Five-element thought; Han Fu; time and space; color; sense of order

[责任编辑:唐 普]

<sup>①</sup>萧统《文选》,李善注,第176-180页。